

## 20 世纪道教文学研究的历史性总结

### ——读《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有感

陈 文 新

由吴光正等三位学者主编的《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洋洋近百万言，已于2006年6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份量厚重、值得一读的书，主编拟定的书名也切题而且精彩。的确，在道教与古代文学的衔接处，最富魅力的正是想象力的世界，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那些才情不凡、受道教濡染的作家在静默中观照幻象，也热爱幻象，并依靠其内在的、能看到幻象的官能去创造幻象。人类的视野和认识本来被禁锢在狭小的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一旦窗户敞开，使之得以眺望远方异域，怎么不令读者兴奋和沉醉呢？怎么不令研究者击节喝彩呢？如葛兆光教授所说：宗教依靠这种想象力和意志构造神谱，维系信仰，文学依靠这种想象力和意象来创造美的意境，抒发自己的感情。由于这种在思维、情感、内容上的一致性，文学与宗教常常不由自主地联姻，宗教给文学提供大量神奇谲诡、瑰丽多彩的意象并刺激文学的想象力。因此，尽管文学家未必都是宗教信仰徒，但仍然能接受宗教的影响，而一旦文学家受到了这种影响，就会出现宗教式的思维习惯、情感方式、意象群落不断渗入文学领域的现象，使文学作品极浓重地表现出这种与宗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感情、意象，表现出在文明时代已久受潜抑了的、出类拔萃的想象力。道教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也正表现在这里。第一，它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第二，它提供了许许多多神奇的意象；第三，这些意象的凝固形态作为“典故”渗透在中国古典诗词之中，而这些意象的扩展形态则作为“情节”、“场面”及“原型”出现在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之中。葛兆光教授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想象力的世界”这一书名的丰富内涵。

《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展现了20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阵容，代表了20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其编选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20世纪的“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20—40年代的创建期、50-70年代的变质期、80年代的转型期、90年代的深化期，各个时期专题研究的特色突出表现为学术语境的变迁与论述话语的转换。创建期的学术研究已经触及到了“道教与古代文学”的各个层面并且确立了相关的研究范式。主要涉及五个层面：关于道教对文人的影响；关于神话和仙话；关于游仙诗；关于道教与小说戏剧的关系；关于“道藏”文学。其研究者鲁迅、王瑶、李长之、陈寅恪、吴梅等都是20世纪的学术大家，他们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事学术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50年代至70年代，阶级性、人民性、封建性糟粕、民主性精华是评价古代文学的几个关键词。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中，宗教被视为毒害人民的鸦片，“道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被打入冷宫，创建期的相关成果遭到批判。一部分研究者试图将阶级分析理论用于“道教与古代文学”领域，结果出现了几次富于喜剧性的辩论。80年代的“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是在“拨乱反正”和文化热的背景下展开的，宗旨所在，首先是为了建构一种文化理想，热烈的阐释居多，而纯学理的探讨较少。葛兆光强调，道教之所以能对文人生活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原因在于，它激发了他们对生命本体和人生意义的探寻，引发了他们的内心深处的生命力的张扬和情欲的高涨，刺激了他们的想

象力的回归。在他看来,“古代中国人不能突破封建伦理道德的限制,而把情欲满足转移到宗教行为中,不能理解生命的生理局限不可逾越,而把超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宗教幻想中。”联系当时文化界那种“拨乱反正”的热情,不难理解这种研究的现实针对性。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过渡,90年代的研究更注重从学理上探讨“道教与古代文学”,或以还原历史客观性为目标,或以开拓新的研究视野为旨归,或以建立新的研究范式为目的,相关研究更具有学院派风味,其中,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葛兆光的《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王青的《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而黄世中、孙逊的研究也不乏引人注目之处。黄世中《道教与唐诗》一书认为:那些感慨人生短暂以生死为主题的诗篇充满着惆怅之美,那些歌咏人仙之恋破灭的诗篇含蕴着感伤之美,那些感叹世路坎坷否定荣辱得失的诗篇充满着傲岸之美,那些歌咏山水田园以回归自然为宗旨的诗篇则有一种静穆之美,惆怅、感伤、傲岸和静穆恰好成为道蕴诗审美中的一个多维结构,而其交会点则在于,道教徒和崇道者大都是失意者、在野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家和道教美学是失意者的美学。孙逊《古代小说与宗教》注重从历史演变中梳理宗教观念向世俗情感的演变。他认为,频繁出现于明清小说中的胡僧具有浓厚的性色彩,这种性色彩和道士味与六朝隋唐的胡僧无涉而与元代以来密教文化的广泛内传及密道文化的紧密交融密切相关;唐人小说中的仙妓合流现象跟历史无涉而主要与唐代社会现实、文人狎妓经历密切相关,这种合流塑造了超逸而多情的女性形象,提升了婚恋悲剧的格调,产生了与事功不朽观相对立的情感不朽观;古代小说中的情僧在空与情的对立结构中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最终集成地造就了《红楼梦》中“情不情”的贾宝玉——一个情门的仁者和佛门的智者。这些见解不乏耐人寻味之处。而本文要强调的是,由于吴光正等三位主编对20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了如指掌,《论丛》所选的论文不仅涵盖了各个研究阶段,而且具有代表性,他们是真正把这部书的编选当作一桩重要的学术事业来做的。可以有把握地说:阅读《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辅以该书附录的《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论著索引》,我们对20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的历史可望获得清晰的了解,并顺理成章地进入“道教文学史”的领域。换句话说,《论丛》也是可以当作一部“道教文学史”来读的。

道教文学和受道教影响的文学,都是“道教与古代文学”这一专题的研究对象。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虽不一致,但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即,在道教与古代文学发生关系时,我们的研究是聚焦于与文学有关的“道教”还是聚焦于文学中的“道教”?焦点的不同,不仅体现出切入角度的差异,而且体现出研究宗旨的差异,并将导致阐释方法的差异。如果一个研究者过分关注文学中的“道教”而忽略与文学有关的“道教”,其学术取径可能存在某种危险。在翻读这部《论丛》时,我注意到,热衷于对“道教”加以阐释,而不太注重从文学的角度感受作品,其负面后果是,很可能做出“煞风景”之论,以致将本来情味盎然的文学作品弄得索然寡味。袁枚《随园诗话》卷七第29则曾对作品阐释中的这种“煞风景”现象加以调侃:

七夕,牛郎、织女双星渡河,此不过“月桂”、“日乌”、“乘槎”、“化蝶”之类,妄言妄听,作点缀词章用耳。近见蒋荅生作诗,力辨其诬,殊觉无谓。尝调之云:“譬如赞美人‘秀色可餐’,君必争‘人肉吃不得’,算不得聪明也。”

袁枚指出的这种现象是需要加以警惕的。在艺术批评中,有一种议论,虽然条条有理,头头是道,但却破坏了美好的情调,使人扫兴,这就是所谓“煞风景语”,即袁枚说的“算不得聪明”。一个人惯作“煞风景语”,我们可以承认他聪明,但只是“算不得聪明”的“聪明”,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聪明”。毋庸讳言的是,在“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中,这种“算不得聪明”的“聪明”是存在的,并已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分别代表精、气、神,精、气、神分藏于心肾脾三脏(藏),构成“唐三藏”,故唐三藏的西天取经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精气神心肾脾三者合一的过程;凡此种种,不一定说错了,却说得毫无情调,太煞风景。提醒我们对这种“算不得聪明”的研究方式保持适度的戒备心理,这是《论丛》的又一个贡献。